

权力欲望中的主权想象

——试论 1863 年《法柬条约》的历史意义

孙建楠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柬埔寨历史的编纂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学界普遍认为 1863 年的《法柬条约》的意义乃是标志着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本文将从《法柬条约》的文本入手,重新释读该条约的历史意义,以揭示出该条约的签订曾在法国、柬埔寨和暹罗 3 国之间掀起一场话语权争端。并且在争端的背后,柬埔寨固有的空间话语系统开始被严重摧毁,法国殖民者的主权想象通过权力机制的运作不断折射在柬埔寨。

关键词:权力; 主权; 法柬条约

中图分类号: K33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1)04-0089-10

1977 年 9 月,当一位名叫沙络斯·萨(Saloth Sar)的中年男人身着精心打造的革命家的华服,情绪激昂地向柬埔寨人介绍“原始高棉化”(Khmer Daem)的革命理念时,有人可曾预料到在这片造就了伟大吴哥文明的圣地上突然出现了“人口大转移”、“200 万人集体消失”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为什么沙络斯·萨会摇身一变成为波尔布特?为何这些手持共产主义理念红宝书的高棉民族主义者会最终把柬埔寨推入堆斯陵(Toul Sleng)?^①这些始终是困扰当代东南亚学界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审视红色高棉的悲剧成因时,需要对柬埔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脉络进行梳理。换言之,我们必须探析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柬埔寨固有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崩解的。长久以来,国内外东南亚学界普遍认为 1863 年的《法柬条约》的意义乃是标志着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历史是一种论辩,而论辩提供了变化的机会,它可以允许我们提出异议并提供拒绝服从的工具。^[1]在本文中,笔者不仅要大胆推翻此结论以重新审视此条约的历史意义,同时亦将此段历史放置于帝国研究的宏观框架中,此外笔者还会在论述时将柬埔寨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以期揭示出现实即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映。

一、虚幻的条约与重叠性话语

1864 年蒙固国王致诺罗敦国王的一封信写道:

收稿日期:2011-08-25

作者简介:孙建楠,男,北京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士生。

^① 堆斯陵是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在金边的一个恐怖监狱(S-21)的中文译名,亦称为“堆尸陵”。

“法国领事 Aubaret 先生……提议:暹罗和法国应当一同为柬埔寨国王加冕,这是遵循以往柬埔寨的几位国王加冕典礼的惯例,即从曼谷接受用金色羊皮纸制成的登基任命书,之后从越方手中获取王位称号 HONG(等同于中国授予一个进贡国国王的称号)……在那些情况下,他们采用与暹罗一致的泰方官衔,他们也同样采用与越方一致的越南式官称。越南与暹罗互有敌意,所以要采用分别任命的方式。每种称呼都适用于柬埔寨。在暹罗和越南均声称柬埔寨臣服于自己时,法国方面保持沉默。然而在法国控制越南南方之后,柬埔寨遂成为了法国的邻居……由于法国与暹罗交好,所以柬埔寨与暹罗之间的和睦关系将得到维持。法国与暹罗在柬埔寨问题上拥有同样的权利……法国领事讲到他会遵循与国王先生您在乌东签署的协定(1863年协定)……法国的高级官员们已经详细地商讨了此事,并已经一致同意派遣代表 Phraya Montrisuriyawong 授予您加冕的金色羊皮书与徽章。”^[2]

蒙固国王在这封信中是否真正传达了这位法国领事的原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至少从这封信中看出蒙固及其幕僚所理解的是:法国在与柬埔寨签订“19点条约”后并没有切断柬埔寨对暹罗的朝贡关系,这也同暹罗一方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相一致。^[3]果真如信中所说的话,为何在1864年6月3日加冕典礼当日,暹罗敦国王却是从法国官员手中接过暹罗保存多年的皇冠和王室玉器?^[4]

《蒙固国王皇家通信》一书中亦明确记载,1863年法柬条约签订之前,法国早已得知暹罗一方左右柬埔寨皇室事务,但并不愿意涉足其中;1861年柬埔寨皇室内部再次发生内讧,法国拒绝了柬埔寨请求其保护的请求。^[5]当法柬两国未通知暹罗的情况下在1863年缔结条约时,暹罗得知后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法国海军指挥官1863年10月5日“义正词严”地回复泰国,柬埔寨乃是一个“具有主权且独立的国家”,因此柬埔寨不需要照会任何国家即可与交趾支那政府签订条约。^[6]但若按照法国领事对蒙固国王的承诺,法暹两国在柬埔寨问题应拥有同样的权利,法国为何出尔反尔?东猜先生在详细研究《蒙固国王信札》一书后认为“暹罗起初并不明晰法柬两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在熟知的朝贡关系角度内认为法国会接替越南成为柬埔寨的新主人,并推导出柬埔寨同时附庸于暹法两国。暹罗视法国为朋友并同意由法国照看柬国统治者,因此柬埔寨应当继续在朝贡体系的框架内同时臣服于曼谷和巴黎。”^[7]依据东猜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推导出在真实的历史中,法国一方不是在朝贡关系的角度思考法柬关系,但史学界却普遍认定法柬条约是柬埔寨陷入殖民主义漩涡并沦为法国保护国的标志。此外,法柬条约签订后,为何暹罗会勃然大怒?为何柬埔寨不顾法国的反对毅然地跑去曼谷与暹罗签订密约?弱小的柬埔寨怎会如此的大胆?实际上法国究竟有没有认识到柬暹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法国领事向蒙固国王承诺的所谓“同等权利”为何与事实相违背?为何暹罗最终被法国愚弄了?仅仅是暹罗面对法国的坚船利炮的恫吓下做出的妥协吗?这个混乱局面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何史料的记载和结论却显示出如此巨大的矛盾?

从知识的产生条件和生产机制考察,人们对所谓观念的理解和误读总是参与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创造。^[8]那么史学家、柬埔寨、暹罗和法国四者中,哪一方误读了历史?笔者试图首先从1863年法柬两国签署的条约中考察法国是在何种话语框架内认识法柬关系的。

法兰西国王任命西贡总督、海军上将格朗地耶作为代表强迫暹罗敦签署此条约,此文件共分19条,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下内容:

第二条:法兰西国王将任命一名法国官员为领事,驻扎在柬埔寨朝廷……这位法国官员遵照西贡总司令的命令行事。柬埔寨亲王也将指派一名柬埔寨官员担任领事,驻扎在西贡。

第三条:如果一名法国官员依照第二条之规定以领事的身份驻扎在柬埔寨,应得到显贵的待遇。

第四条: 如有其他国家希望派驻领事驻扎……经法柬双方同意后, 该国家才可派驻领事。

第七条: 如果法国臣民和柬埔寨人发生纠纷, 必须向法国领事提出申诉……如果柬埔寨人之间发生纠纷, 法国领事不得干预……如果法国领事或法国官员均不在柬埔寨, 法国总司令有权代行领事权……

第九条: 如果柬埔寨臣民要求居住在法兰西的领土上……由柬埔寨当局予以登记, 或者由柬埔寨亲王指派驻扎西贡的柬埔寨官员予以登记。^①

从以上文字,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法国殖民者在自己所处的话语框架内编织了一整套符合自身利益的条约, 输出了领事、领土和侨民登记等迥异于柬埔寨文化体系的概念, 即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形态。

诺罗敦虽然在条约上签字, 但随后在 8 月 15 日致信向暹罗国王报告了此事, 并附上了被迫签署的条约抄本。在信中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那项条约, 因为柬埔寨是暹罗的藩属, 我担心会犯错误……这项条约是否超乎常理, 请陛下斟酌, 因为您是我的靠山, 我今后的幸福全靠陛下。”^[9] 暹罗朝廷获悉后, 立即致函法国海军上校西蒙,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 我已经收到柬埔寨亲王的来函, 随信附来所谓的一项条约副本, 这项条约是他被迫同法国签订的……他根本无权签订这样一项条约……我还有其他理由怀疑业已签订的这一条约中的所有有益之处法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暹罗国王陛下那里得到”。^[10] 此处的文字可以反映出暹罗一方对法国的行为非常气愤, 信中措辞毫不客气。当我们在上一节回顾柬埔寨和暹越两国的关系时看到, 柬埔寨犹如一只失声的羔羊被“暹罗虎”和“越南鳄”任意吞食, 然而在法国殖民者面前却坚定地说“不”, 这确实值得进一步深究。

西蒙上校在曼谷接到此信后于 9 月 20 日回函, 向暹罗声明诺罗敦完全是自愿在条约上签字, 并强调“柬埔寨和我们的属地^②接壤, 有一段相当长的共同边界, 边界线至今尚未明确划定……柬埔寨长期以来就是顺化王朝的藩属, 而我国现在已继承顺化王朝的权益……阁下的这些措辞^③,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业已涉及到暹罗国王对柬埔寨的主权要求……柬埔寨处于两个互相敌对的强邻之间……现在法国取代了越南的地位, 但法国和暹罗保持着友好关系。阁下将会像我一样地理解到, 目前这样一种崭新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暹罗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但是变化多大? 到了什么限度? 对于这些问题, 暹罗国王陛下必须加以考虑, 而陛下的意愿对这个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1]

假若法国果真按照信中所说取代越南的地位, 就意味着法国和柬埔寨将建立朝贡关系, 但信中却反复出现边界划定、主权等概念, 这显然与朝贡关系的实质相抵触。若从曼谷朝廷的角度思考, “暹罗对柬埔寨主权要求之说”就显得异常费解, 何为主权? 何为划定边界? 西蒙上校的措辞之间似乎充满着矛盾。

暹罗立即在 9 月 22 日回复法国, “请允许我略为陈述暹罗王国周围几个小国的情况。和平时期, 这些国家通常向暹罗朝廷进贡, 其中每年进贡一次, 另一些则每 3 年进贡一次。倘若国家遭难, 暹罗就向它们提供适当的援助, 以平定骚乱。如果在朝当政的兄弟之间发生不和, 我们就依据当事者多数人的愿望, 本着公正的立场, 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 以应付紧急情况。如果敌对派系的成员不能在其国家居留, 通常逃到暹罗来避难。除此之外, 我们对他们不加别的限制。……关于阁下所

① Manich Jumsai, *History of Thailand & Cambodia: from the days of Angkor to the present*. Bangkok: Chalermnit, 1970, pp. 134-135. 需要注意的是, 该书作者搜集了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中有关法国、柬埔寨和暹罗三方就《法柬条约》签订一事而出现的三国间官方书信, 因此具备一定的历史说服力。

② 属地指越南。

③ 此措辞指暹罗国王在 1863 年 9 月 19 日致西蒙的信中称法国在法柬条约中获取的权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曼谷朝廷中获取。

提到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暹罗政府多少知道友好和毗邻小国的一些成规和惯例,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将乐意按照这些有着友好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惯例做出合理的调整,使你我双方都能接受。但是我们暹罗人对涉及毗邻小国关系的国际法则很不熟悉,处理当前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因而,眼下我无法对阁下说前面所说的话哪些是对的”。^[12]

由此可见,暹罗和法国双方并不是在同一个“国家间关系的框架”中理解柬埔寨的地位问题,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柬埔寨近代历史的认识。首先,曼谷一方在9月22日的信中道明了朝贡关系的本质:柬埔寨通过定期奉上贡品以求得暹罗的保护和援助,暹罗一方做为柬埔寨“主人”的权利和义务仅限于此。诚如东猜先生所论,柬埔寨是依附在暹罗、越南共同主导下的朝贡体系里,但其并未丧失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中的“独立权”和“自制权”,柬埔寨君主始终视自己是独立的,暹越两国实际分享的只是柬埔寨“等级层面上主权”(a sovereignty of hierarchical layers),并非一种分割性主权(a divided sovereignty)。^[13]曼谷朝廷天真地认为,法国则是代替越南成为柬埔寨的“继母”,法暹两国就理应处于一种平衡的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柬埔寨通过奉上的贡品向暹罗和法国传达着服从和寻求保护的愿望,或者说是同受贡者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纳贡既可说是一种带有被强迫性的非主观意愿,也可以解释为带有自愿性特点以求得生存的战术。柬埔寨国王则同暹罗均是在一个话语架构中认识此问题。而另一方面,法国殖民者却是依照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蓝本,把19世纪的柬埔寨看成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伸,一厢情愿地把主权国家、边界划定、条约的缔结等“文明观念”播撒至柬埔寨。虽然法国在致暹罗的信中一再声称将接替越南成为柬埔寨的新主人,但却利用主权国家的话语同暹罗对话,所以导致双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二、权力机制下的话语权争端

由以上论述可见,1863年的条约并未从根本上迫使柬埔寨转变为法国保护国,再加上1840-1842年间柬埔寨东部地区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反越农民大起义后,柬暹两国更为亲近,柬埔寨也就更加认同与暹罗签署的密约。这就不难理解弱小的柬埔寨为何与法国签署条约后会如此“背信弃义”,“大胆地”投向曼谷朝廷,也就不难理解法国殖民者为何会向暹罗解释柬埔寨是主权国家,后又允许柬暹两国保持“友好关系”,并慷慨地邀请蒙固国王参加诺罗敦加冕典礼的原因。

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称某文为某文的误读,或把这种误读看成一种通常的理解性错误,无异于无视历史和具体事件发生的环境”。^[14]柬埔寨、暹罗和法国作为两个对立面在误读对方话语的基础上才出现了对抗的局面,众多的史学前辈也纷纷误读或忽略了这段历史的进程:捷缅茨也夫认为法国东来前,“暹罗和越南在这个地区的某种力量均势使得柬埔寨保留了一定主权”的观点^[15];汤姆森在叙述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后,“一旦法国取得了整个越南南部,与暹罗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因为这样一来,两国的领土就连接在一起……拉玛四世还支持安东在柬越边界进行军事对抗”^[16];汪新生先生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撰文指出:“暹罗政府在处理柬埔寨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依然从封建大国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加紧控制柬埔寨的君主,在谈判桌上与法国做外交的争夺……1863年《法柬条约》的签订是关于柬埔寨主权问题国际争夺的重要转折,它改变了外部政治势力在印支半岛的均势,宣告了暹罗封建统治者挟制弱小邻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政策的失败,东南亚封建君主的地区争夺让位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为获取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斗争”。^[17]陈显泗先生在《柬埔寨两千年史》中讲述到:“从总共19条的法柬条约中法国人获取了许多权益,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宗教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国享有了对柬埔寨的宗主权……法国殖民者所坚持和实行的宗主继承权通过1863年的法柬条约给予了肯定地承认。至此,在原则上确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宗主权”。^[18]

在笔者看来,以上诸位学者均误读了这场重要的纷争历史,同样也忽视了话语冲突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所采用的剖析框架同法国殖民者如出一辙。但更为吊诡的是这几位学者在分析时又生硬地把法国所欲谋取的“主权”偷换成了“保护权”,上文的论证足以支撑笔者的这一观点。

所以我们必须突破既有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中叶柬埔寨历史,特别是并未受到注意的这场暹罗与法国之间的话语权争端。实际上这场针对柬埔寨地位的冲突并没有胜利者,更谈不上对柬埔寨地位的改变,真正凸显的只是一场“话语的误会”。格里高利·尤斯达尼斯(Gregory Jusdanis)在分析希腊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整合过程中,曾做出如下分析:“对他们(指希腊)而言,现代性与西方是同义词……希腊的情形表明,第三世界现代化总体论述中的二分思路,从一开始就公然在场。与现代性最初的遭遇,使希腊社会被投放到意识形态对抗(东方-西方),传统与现代(纯粹的希腊语-现代希腊语),古典-当代(族群-国家)的激流当中,而这些对抗导致了社会的动荡,有时促成了暴力。为舒缓张力,即便仅仅是以想象的方式,另一种现代的建构也被输入进来,这便是自主的审美活动”。^[19]尤斯达尼斯笔下的“审美活动”指的是一种表述和象征,这类表述内容决定着民族(更准确地说是国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态。尤斯达尼斯的这段论述恰好可与中南半岛上的话语争端形成类比,在笔者研究的案例中,柬埔寨也同希腊一样与“现代性”不期而遇,这种现代性的话语表述方式则为条约,柬埔寨在被改造为民族-国家之前,已经通过条约的想象路径在话语的意义上体验了与其迥异的意识形态。

笔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话语权争端恰恰印证了萨义德的观点,即“殖民者利用主权国家间的条约制度把某一具体地点位移至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这相当于运用准法律的方法来使权力在殖民地场域中的扩散正当化”。^[20]换言之,法国殖民者正是用条约制度去把自己的想象投射到柬埔寨固有的话语系统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柬埔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脍炙人口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和殖民地考古机构这4项诞生于19世纪中叶前的发明即为权力机制的代表物,这4种发明的形态和功能在进入殖民地后以间接的方式激起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最终形塑了与宗主国相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21]“权力”指改造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或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22]知识及信息产生权力,殖民者将其与殖民地间的文化差异首先构想为一种边界,然后再将其构想为迫使西方对文化他者进行控制和统治的推动力。由此,知识与权力之间在帝国主义的宰制系统中形成一种循环^[23]。权力机制即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体。在本文中,因1863年《法柬条约》的签订引起的话语权争端即是法国帝国主义宰制系统中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

三、空间话语场的崩解: Srok 的意义转换

1863年《柬法条约》的第十八条写道:“为了表达对法兰西皇帝为促进柬埔寨的和平与繁荣而提供保护的诚挚感谢,柬埔寨人同意让法国人在柬埔寨的森林中砍伐树木,以建造法兰西皇帝所需船只,只要他们通知柬埔寨政府就行,柬埔寨政府将就此事向内政部长下达指示”。^[24]那么,这看似不起眼的条文有何重大的历史意义呢?

路易斯·德拉波特^①于1880年曾经写道:“法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克服并破除‘土著高棉人的迷信思想’,之后他大力动员土著苦力打压‘多种植被的蔓生及其对吴哥建筑群的侵袭’”。^[25]法国主导的对吴哥城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扫工作最早可以追溯至1870年,在这一年为了迎

^① 路易斯·德拉波特(1842-1925),法国探险家和艺术家,生前作为殖民政府官员在柬埔寨搜集了很多艺术品,尔后成为印度支那博物馆馆长。

接到访的柬埔寨驻扎官,大批僧侣们被动员起来铲除树木,殖民政府一直试图实行“去森林化”并使这些建筑群与周围环境分离,以使吴哥建筑群“世俗化”。^[26]如若翻阅19世纪欧洲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可发现欧洲人对“森林”的描述的一个相同之处:森林是恶狼和巫婆占据的危险地域,儿童往往被遗弃在丛林中或被残忍地杀害。^[27]而在柬埔寨传统民间故事中,森林的形象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空间,保护儿童躲避杀害的场域;森林也是宗教场所、古代神灵、祖先魂魄(neak-ta)的庇护所和藏宝室;森林亦受到天王的保护。^{[28][29][30]}

可见东西方对于森林的认识截然相反,那么德拉波特面对柬埔寨的“迷信思想”所掀起的“去森林化”运动不是充满着矛盾吗?法国哲人德里达如是说:“每个概念的构建必然引入鬼迷心窍的因素,从存在和时间这两个概念开始,一直到其他所有的概念都必定要经历这个过程,即魂迷论。而本体论与魂迷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本体论是一种念魔咒的驱鬼运动”。^[31]德里达的观察极具洞见性,我们是否能将这一洞见进一步延伸,我们是否可以说法兰西帝国被自己投射到他者(柬埔寨)身上的恐惧所鬼迷心窍,所以才要利用“去森林化”的行为驱除这一恐惧来获得自身的本体呢?显而易见的是,在1867年法国正式成为柬埔寨宗主国后,殖民主义者最终利用地图制述法建构出一个柬埔寨理应所处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又绝非“空间现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假设,法国人逾越“空间现实”的想象行为是否就是德里达笔下的驱鬼运动呢?那么这个“魔鬼”的原型是什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高棉人是怎样解读法国人东来前自己所处的“空间现实”呢?柬埔寨人自古以来如何构建地理知识?柬埔寨现代地理体(modern geo-body)的前世(即前现代地理体-pre-modern geo-body)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帝国研究中普遍忽略的空间话语的转场。

由于现今不存在法国殖民者东来前柬埔寨本地绘制的地图,笔者试图从高棉语中的“国家”一词入手展开分析。现代柬埔寨人使用Srok一词指代“国家”,然而这个词亦有“村庄”的意思。著名柬埔寨历史专家钱德勒先生上世纪70年代成功释读了建都吴哥的国王耶输跋摩一世(889-910)时期有关地名的碑铭,他发现铭文中所记载的地名均是村落和若干宗教场所的名称,换言之,每个关于村落的地名都使用了Srok这个高棉语单词。柬埔寨自古以来又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文明国家,交通极为不便,村民只能对村落外小范围的区域有所了解。一些稻作乡村(Srok)广泛分布在森林(Prei)和旷野之中,另一些Srok分布在佛寺周围,靠近蓄水池或河流。^①此外柬埔寨的古代民间故事中还有着如下描述:“很久以前,那里没有运河,更没有道路;那里仅有森林(Prei)、老虎、大象和野牛在丛林中出没;没有人胆敢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基于这一缘由,几乎无人曾到访至王都。假若有人乘船经过那里,村民就会向他询问国王的容貌……当然,这位过路者也许从未见过国王”。^[32]钱氏据此大胆地推断早期高棉人对空间的认知是以村落为纽带,宗教朝圣地为中心。^[33]

东猜先生在《暹罗地理体历史》一书中展示了1851蒙固国王登基之前所存在的两种手工绘制的地图,其中一种为佛教宇宙图,起源于素可泰国时期。此类地图是一种以佛教故事为中心的长篇延展型地图折本^[34],这是对传统小乘佛教3个世界宇宙论(Traiphum Cosmography)^②的形式化表现,这可说明早期泰族人对空间的认知是以朝圣地为中心,把尘世之上的天国和尘世之下的地域沿着单一的垂直线轴嵌入一个可见的空间中。由此推知,这种地图绘制法是以寻求奖赏与救赎为宗

①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 124-125. 另请参阅 Saveros Le-witz, “La Toponymie Khmère”, *BEFEO*, Vol. 53, No. 2, 1967; E. Aymonier, *Geographie du Cambodge*, Paris: 1876, pp. 31-59; Jean Delvet, *Le Paysan Cambodgien*, Paris: 1962, pp. 322-370.

② 俗称三界图,即前世、现世和冥界。

教目的,而非以划定疆域为目的。^{[35][36][37]}此外在一份18世纪的地图中,现今泰国北部省份所在地是与南瞻部洲(Jambudipa)接壤的,图中并未出现现今的缅甸,假若做为读图者的我们离开信徒心中谨守的规则是无法理解暹罗制图者对空间的认知。^{[38][39][40]}再如我国南宋时期《佛祖统记》中所载的四洲九山八海图也可反映出当时部分中国人对空间的感知:此图描绘了以日月环绕、以须弥山为中心铺展开的大地,东、西、南、北四个大洲,九层山地和八个水域。^[41]这恰好与钱德勒先生对高棉人空间认知的推论相类似。显而易见的是,古代的宗教信仰者所绘制的空间图是对一种信仰的再现。虽然并无存留至今的高棉人所绘制的空间图,但钱德勒先生对吴哥时期高棉人对空间认知的推测就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由于宗教信仰和不便捷的交通条件的影响,柬埔寨的历史传统中王国是由多个地方性村落和神灵崇拜组成的类似“联邦制”的国度。^{[42][43]}高棉人所使用的空间图并非指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很可能是一张广泛分布着宗教寺庙的朝圣地图。换言之,高棉人的地理空间思想中并不包含现代地图上被线条勾勒出的柬埔寨国家这类概念。

帝国主义鬼魂降临至柬埔寨之前,在农业社会文明的普照下高棉人组成了无数个封闭型小社群,更进一步说柬埔寨原是一个“农业文化政体”(agro-literate polity)正如盖尔纳先生极具洞见性的分析,“在这种小社群内个人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而文化却产生了一种边界并形成一种联系体系,它以信仰认可为依托微妙地组成群体,相互交叠,相互缠绕……决定政治疆界的单位并未明显形成……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单位的结合,亦不利于每个政治单位保持文化的同质性和学校传播的本质。”^[44]传统国家和民族国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即是前者只有边陲而无国界,其国家体系整合的水平相对有限^[45],而1904年法暹两国组成边界划定委员会后,现代地图制述法划定的“边界”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取代了过去由宗教文化所划定的“信仰界线”。^①最终,1907年法暹条约的签订完全摧毁了柬埔寨和暹罗所共享的空间话语体系,“自然”的界线被“人为”的边界所取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新形式的话语力量发挥作用^②,于是领土意识主导的空间行为方式^③遂开始打破 Srok(村落)之间的封闭性。这最终导致 Srok 一词在20世纪初发生了符号学的转换^④,由村落转变为国家的涵义。^⑤

由以上论述可以窥探出,1863年《法柬条约》中的第十八条乃是殖民者摧毁古代高棉人对传统空间认知体系的标志性开端,当殖民者催促苦力砍倒一棵棵树木时,这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行为却悲剧性地摧毁了高棉人固有的宇宙观,神灵丧失了栖息地,森林(Prei)则不再是 Srok 再生之场所。^[46]在 Srok 和 Prei 构建的空间体系被摧毁后,我们就不难理解西哈努克亲王为何在独立时期依据殖民者的城市设计把柬埔寨划分为“城市”,“城乡结合”以及“农村”的国家空间理念。^[47]红色高棉的领袖们不仅把森林(Prei)当作根据地,而且残忍地将异己的鲜血撒泼在此神灵诞生之地。^[48]卡迪认为,“一些新的殖民政权往往设置人为的疆界,有时把民族和种族的统一体搞得四分五裂”^[49],想必

① 西班牙学者胡安·诺格先生指出“边界”一词具有地缘政治的意义,是与权力和立国理由紧密相连,这一概念为民族-国家所专用;而非民族国家用“界线”一词较为妥当。引自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② E. R. Leach, “The Frontiers of Bur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 1 (Oct. 1960), pp. 49-68. 著名缅甸人类学家埃德蒙·李奇对缅甸“边界”的形成做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可以与笔者所剖析的柬埔寨案例形成类比。

③ 亦可理解为边界意识主导的主权国家行为方式,这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的柬埔寨历史发展。

④ 除 Srok 一词外,现代高棉语“独立”(Ekkariet)一词来源于梵语和巴利语,原义指国王、主宰众生的人或傲慢冷酷之人,其与当代泰语“独立”一词同根,从中我们可窥探出话语体系的转变。关于此方面的探讨,请参见 T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1994, pp. 135-139.

⑤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1926年一份名为 Srok Khmer 的高棉文杂志应运而生。

他并未观察到“人为疆界”的背后乃是民族传统的永久泯灭。

四、结语

综上所述,1863年《法柬条约》充斥着矛盾,法国意图谋取柬埔寨“主权”,并非保护权;且《法柬条约》签订之时顺化割让西贡的条约并未得到法国批准,即使得到批准也并不代表法国可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直接进入朝贡国家间关系的框架。

笔者经过以上论述认为,此条约的历史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国殖民者本能地(或有意地)歪曲柬埔寨两国所一贯使用的话语系统,这不仅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更深刻地形塑了东西方之间的现代历史和关系。第二,这项条约引发的争端标志着法国殖民者闯入了柬埔寨传统的话语结构,并利用主权国家间的条约制度想象出一条意义链。条约制度横踞在不同文化的巨大鸿沟之间,无法跨越语言和表义的差异,但条约这种权力制度在引诱、迫使或指示法国对柬埔寨的想象行为穿越不同文化的疆界进行移植和传播,并最终结合坚船、利炮等现代技术残酷地摧毁柬埔寨的政治体系。第三,不同语言间虚拟对等关系的历史建构过程开始出现。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无法获取到由米希主教翻译成高棉文的条约原文,但可以推断领事、领事权、边界、主权、民族-国家等词语开始经由这份重要的条约进入高棉文。法国人的“条约想象”开始驱使柬埔寨人接受一套由客方语言(法语)进入主方语言(高棉语)的新知识,这套新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在主方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

注释:

- [1] John H. Arnold,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2000, p. 122.
- [2] [5] [6] [7] King Mongkut, *Phraratchahatthalekha phrabatsomdet phrachomkloachaoyuhua* [蒙固国王皇家通信], Bangkok: Mahamakut Royal College, 1978, pp. 115-116, 转引自 T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92-93, 97-98, 99-100, 103.
- [3] *Thiphakorawong*, [第四王朝], vol. 2, pp. 46-47, 转引自 Siam Mapped, T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94.
- [4]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8页。
- [8]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20页。
- [9] [10] [11] [12] Manich Jumsai, *History of Thailand & Cambodia: from the days of Angkor to the present*. Bangkok: Chalermit, 1970, pp. 146, 137-138, 138, 140.
- [13] T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88.
- [14] [23]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301、45、59页。
- [15] 捷缅茨也夫:《法国侵占柬埔寨的过程》,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62年第1期。
- [16] R. S. Thomps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9(4), p. 318.
- [17] 汪新生:《19世纪中叶柬埔寨主权问题上的国际斗争》,载《东南亚学刊》1997年第1期,第31页-36页。
- [18]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5-567页。
- [19] [20] Gregory Jusdanis, *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xiv, pp. 174-175.
- [2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 11.

1991 , pp. 163-185.

- [22][45]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63页。
- [24] 琼赛《泰国与柬埔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1-232页。
- [25] Louis Delaporte: *Voyage au Cambodge: L'architecture Khmer* , p. 255
- [26] Penny Edwards , *Cambodge ,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 1860-1945*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07 , p. 126
- [27] Bruno Bettelheim , *The Use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tales* , p. 94.
- [28] David Chandler , “Songs 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 Perceptions of Order in Three Cambodian Texts” in *Moral Ord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ange: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Thoughts* , New Haven , Conn. :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1982 , pp. 53-77.
- [29] Judith M. Jacobs ,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f Cambodia: a Preliminary Guide*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 18.
- [30] Penny Edwards , “Between a Song and a Prei: Tracking Cambodian History and Cosmology Through the Forest” , in *People of Virtue: Reconfiguring Religion Power and Moral Order in Cambodia Today* , edited by Alexandra Kent and David Chandler , Copenhagen : NIAS Press , 2008 , p. 139-146.
- [31] Jacque Derrida ,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 the Work of mourning ,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 New York: Routledge , 1994 , p. 161.
- [32] 柬埔寨风俗委员会《柬埔寨民间故事集》第94·004号档案,金边:佛教研究院,转引自 David P. Chandler , *A History of Cambod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2 , p. 48.
- [33] David P. Chandler , “Maps for the Ancestors ,” in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1994* , Chiang Mai , Thailand : Silkworm Books , 1996 , p. 25-42.
- [34][41]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4、17页。
- [35] Joseph Schwartzberg , “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ocieties” , in David Woodward , J. B. Harley , eds ,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 pp. 839-840;
- [36] Tongchai Winichakul ,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1994 , pp. 20-36.
- [37] Charles F. Keyes , “Buddhist Pilgrimage Centers and the Twelve Years Circle: Northern Thai Moral Orders in Space and Time” , *History of Religion* , Vol. 15 , no. 1 , 1975.
- [38] Frank E. Reynolds , “Buddhism as a Universal Religion and as a Civic Religion” , in Bardwell L. Smith(ed.) , *Religion and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ailand , Laos and Burma* , Philadelphia: Anima Books , 1978 , pp. 194-203.
- [39] Tongchai Winichakul , “Map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body of Siam” , Stein Tonnesson and Hans Antlov (eds.) , *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 Surrey: Curzon , 1996 , p. 71.
- [40] Winai Pongscripian , “*Traditional Thai Historiography and its Nineteenth Century Decline*” , Ph. D. thesis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1983 , pp. 69-82.
- [42] David P. Chandler , “Maps for the Ancestors ,” in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1994* , Chiang Mai , Thailand : Silkworm Books , 1996 , p. 25-42.
- [43] H. L. Shorto , “*The 32 Myos in the Medieval Mon Kingdom*”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Vol. 26 , no. 3 , 1963 , pp. 572-591.
- [44]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7、9、15、17、5、3、64、65、146页。
- [46] Penny Edwards , “Between a Song and a Prei: Tracking Cambodian History and Cosmology Through the Forest” , in

People of Virtue: Reconfiguring Religion, Power and Moral Order in Cambodia Today, edited by Alexandra Kent and David Chandler,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p. 153.

[47] Francois Ponchaud, "Social Change in the Vortex of Revolution," in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the Death, ed. Karl Jackson, Princet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4-159.

[48] Mary Ebihara, "Memories of the Pol Pot Era in a Cambodian Village," in Cambodia Emerges from the Past: Eight Essays, ed. July Legerwood, Dekalb, IL: 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 CSEA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2, pp. 91-108.

[49]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姚楠、马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740页。

[责任编辑:司 韦]

Sovereign Imagination in the Desire of Power: On the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of 1863 Franco-Cambodia Treaty

SUN Jian-na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 notable feature of historiography of Cambodia is that we almost recognize that the Franco-Cambodia Treaty signed in 1863 marked the imposition of French Protectorate over Cambodia. This article, howev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unnoticed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of this treaty, and argues that the quarrels of discourses among France, Cambodia as well as Siam was directly caused by the Franco-Cambodia Treaty and the indigenous discourse of Cambodia started to have been badly destroyed, and sovereign imaginations of France had been repeatedly reflected onto Cambodia through institutions of power.

Key words: power, sovereignty, Franco-Cambodia Treaty



(上接第 50 页)

Piracy in West part of the Malacca Strait is subject to General Jurisdiction

XUE 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7)

Abstract: In the long term, navig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Straits of Malacca has been manipulated by those littoral countries which exclude direct involvement of non-littoral countries for piracy in the strait. Based on attentive analysis on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and international laws such as UNCLOS, the paper argues that most of piracy happened in the west part of the strait and is subject to general jurisdiction, and that the exclusive claim from littoral countries is lack of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though current anti-piracy institution mainly enforced by them has almost eliminated piracy in the strait for good.

Key words: the Strait of Malacca, piracy, jurisdiction